

ZHONGGUO YUYANXUE

中國語言學

第六輯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国语言学

第六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言学. 第6辑 / 郭锡良, 鲁国尧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301-21954-6

I. 中… II. ①郭…②鲁…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 IV. ①H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1768 号

书 名: 中国语言学 第六辑

著作责任者: 郭锡良 鲁国尧 主编

责任编辑: 杜若明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954-6/H·3231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世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6.5印张 400千字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中国语言学》工作委员会

主 编: 郭锡良(北京大学)、鲁国尧(南京大学)

学术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曹先擢(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陈章太(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侯精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胡壮麟(北京大学)
江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李维琦(湖南师范大学)
陆俭明(北京大学)
钱曾怡(山东大学)
孙良明(山东师范大学)
王 宁(北京师范大学)
邢福义(华中师范大学)
许嘉璐(北京师范大学)
薛凤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詹伯慧(暨南大学)
宗福邦(武汉大学)

陈新雄(台湾师范大学)
戴庆厦(中央民族大学)
胡明扬(中国人民大学)
吉常宏(山东大学)
蒋绍愚(北京大学)
李行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宁继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裘锡圭(复旦大学)
唐作藩(北京大学)
伍铁平(北京师范大学)
徐思益(新疆大学)
许威汉(上海师范大学)
曾宪通(中山大学)
赵振铎(四川大学)

编辑委员会:(按音序排列)

陈保亚(北京大学)
董志翘(南京师范大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
蒋冀骋(湖南师范大学)
李家浩(北京大学)
李小凡(北京大学)
刘晓南(南京大学)
马重奇(福建师范大学)
乔全生(山西大学)
宋绍年(北京大学)
孙玉文(北京大学)
汪国胜(华中师范大学)
王韶松(山东出版集团)
杨端志(山东大学)
殷国光(人民大学)
喻遂生(西南大学)
张 猛(北京语言大学)
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董 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郭芹纳(陕西师范大学)
华学诚(北京语言大学)
李国英(北京师范大学)
李建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李宇明(国家教育部)
卢烈红(武汉大学)
潘文国(华东师范大学)
邵永海(北京大学)
孙建元(广西师范大学)
唐钰明(中山大学)
汪维辉(南京大学)
吴金华(复旦大学)
杨亦鸣(徐州师范大学)
俞理明(四川大学)
曾晓渝(南开大学)
张涌泉(浙江大学)

编辑部主任: 宋绍年、孙玉文、邵永海

目 录

鲁国尧	七八十年前陈寅恪的“老话”和当今中国语言学人的“新话”——在“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发言	(1)
余颂辉	永新、攸县赣方言阳平调的两个来源	(9)
李新良	对预设可取消性的质疑	(20)
李添富	古音声韵系统的开展与还原	(27)
郑 妞	上古疑母和心晓母字特殊谐声关系研究	(35)
程少峰	从《说文》或体的谐声系列看上古声母的分化时代	(62)
陈 宁	从反切看《中州音韵》与《诗词通韵》的关系	(77)
李家浩	先秦古文字与汉魏以来俗字	(88)
向 熹	汉语复音词语单音化举例	(100)
李运富	论“典故词”的词典处理——以《辞源》“射”字头为例	(116)
宋绍年	鲍 楠 关于上古汉语语法系统构建的几个问题	(124)
大西克也	说“生”——上古汉语动词“生”的语义及句法特点	(137)
刘勐宁	陕北清涧话的第三身指代给我们的启示	(153)
张 雁	反义复合词的构造及其历史演变	(165)
张振兴	摆事实,讲道理——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基本法则	(184)
乔全生	王为民 《汉语韵尾辅音演变的音系理据》献疑	(190)
刘俐李	江淮方言入声时长变异实验研究	(196)
薛川东	张 芮 滴水现日月 窥豹知一斑 ——北京市东城区部分高中语文教师文言诗文教学调查报告	(211)
【笔谈】		
郭锡良	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流行释读和评述	(226)
孙玉文	“杰出科研人才”断想	(231)
周京昱	母语基础教育的突围	(239)
【转载】		
王 力	新训诂学	(250)

七八十年前陈寅恪的“老话”和 当今中国语言学人的“新话”

——在“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
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总结发言*

杭州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 鲁国尧

提 要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史大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当今人文诸多学科都涌起传诵、研读陈寅恪先生论著的热潮，以发掘、表彰、承传、发扬其学术和思想，语言学界岂应例外？本文引述陈寅恪先生关于“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与“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辩证观点，加以申论，指出其对中国语言学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继而叙述当今中国学人的“不崇洋，不排外”的现代表述，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走自主创新之路。陈寅恪先生的诗句已经应验，“阳春”与“盛夏”已临神州大地，中国语言学的前景灿烂光明。

关键词 陈寅恪 唯识宗 不崇洋不排外 《中国语言学》

陈寅恪先生（1890—1969），中国二十世纪卓越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史家、语言学史家。江西修水人，青年时游学日本、欧洲、美国，几二十年。归国后，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岭南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文革”中，遭迫害而死。著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陈寅恪先生对中国语言学史也有精深的研究，他的《四声三问》、《从史实论切韵》、《东晋南朝之吴语》都是经典名文，我多次呼吁在语言业内建立“文史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陈寅恪先生的几篇语言学论文正是文史语言学的典范。

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体的生命是非常短暂的。一个人，能迸发出光芒，留下了足迹，是很少很少的；一个人，能有格言深深镌刻在历史的巨柱上，而为后代所仰望，更是极其不易的。陈寅恪先生，不是建功立业、斩将搴旗的将相，只是终身操觚、半生潦倒、晚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联合主办的“中国语言学发展之路——继承、开拓、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27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此次会议是为纪念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10周年诞辰暨祝贺郭锡良教授80华诞而举办，同时也是北大中文系百周年系庆系列学术会议之一。

被害的一介文士，但其声名和论著却能彪炳中华民族史册，垂则千秋。陈寅恪先生的为人传诵的十字真言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字首见于他中年时所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暮年的名著《柳如是别传》第一章缘起再次述及此十字真言：“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今王观堂先生纪念碑矗立于清华大学那标志性的老校门内，在庐山之颠陈寅恪墓的一块巨石上也镌刻着这十个大字。

陈寅恪先生的至理之言很多，我景仰的还有这一段：“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¹只要读过中国史书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历来最重节操，失德败行者为史所贬，操守有玷者遭世訾议。尤其在乱世，孤忠亮节，大义凛然者更为可敬，如此之人史不乏书，凡此皆“中国的脊梁”。陈寅恪先生这廿一字应当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座右铭，时下尤应如此。²

陈寅恪先生的人格、学问、思想，生前身后一直得到海内外的高度推崇，此人所尽知，这里仅举数例：

冯友兰（1895—1990）：“寅恪先生博闻强记，研究所及，极为广泛，在文、史、哲三方面，均能有所树立；中年以后，集中精力研究历史，……他是中国近代历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³

金岳霖（1895—1984）：“陈寅恪的学问确实渊博得很”，“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⁴

李慎之（1923—2003）：“他是全中国学问最大的人。”“世人人都知道陈先生是伟大的史学家，也都知道陈先生是海通百年以来中国唯一遍读中国、印度、西洋三大文化系统的大经大典而能博通综析的人。”“说实在的，即使以史学家而论，也只有陈先生是真正继承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已经不仅是史学家而同时是思想家了。”⁵“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⁶

王元化（1920—2008）：“‘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来的，很少被人注意，这倒是表现‘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之一。”⁷

在中国，专门家多如牛毛，思想家寥若晨星。

二

“学以致用”，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教育和学术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发扬、光

1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第182页

2 “侮食自矜”四字，学人多知其意而不“甚解”，我曾“博问通人”，然终不懈于心，学思久之，自谓得其解。

3 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14卷，第307页

4 刘培岳《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页

5 李慎之《守死善道，强辞矫——读〈吴宓与陈寅恪〉》，《瞭望》周刊1992年第42期

6 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思想家陈寅恪》，《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

7 樊克宁《王元化访谈录》（上），《羊城晚报》2008年1月31日

大这一传统,因此我主张汲取陈寅恪先生的深刻思想,以观察、了解、处理、解决当今的现实中出现的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二百年的思想史、学术史上,有一个问题无一例外地缠绕着每个学人,直击他的心灵,迫使他不得不作出显性的或隐性的表态,那就是如何对待西洋文化、西洋学术和中国传统、中国精神的问题,这个问题“于今为烈”,在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界尤其如此,所以我向在座的诸位学者特别推荐陈寅恪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¹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²

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师,他先是以史为鉴,举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件大事证明他的思想。

其一是玄奘唯识之学在唐代初年的兴衰。玄奘(602—664年),唐代高僧,孤身一人赴印度访学十七年,在印度佛教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大乘僧尊他为“大乘天”,小乘僧誉之为“解脱天”,名震五天竺。回国后,为翻译佛教经典,弘扬教义而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堪称成就辉煌,名高当世。他是伟大的佛教高僧,伟大的佛学专家,梁启超说:“我们若用科学精神,诚实的研究佛教,法相宗的创造者是玄奘,翻译佛教经典最好最多的是玄奘,提倡佛教最用力的是玄奘。中国的佛教,或只举一人作代表,我怕除了玄奘,再难找第二个。”³

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至南北朝时期而臻兴盛,进入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徒纷纷开宗立派。玄奘创建了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或慈恩宗,由于他的极高的学识、极端的热忱,又得到唐太宗、唐高宗的鼎力支持,所以唯识宗盛极一时,然而仅数传之后即衰微而绝。其原因何在?生搬硬套,不加变通,要是用1976年以前的一个常用词语加以概括,就更形象、贴切,那就是唯识宗“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机械地生搬印度佛学,这是它的致命硬伤。

1 关于近几十年习见的“西方”和其前的“西洋”两个词,我宁愿使用后者。何兆武先生(1921—):“‘西方’这个词,在过去,从19世纪一直到1949年,到我这一代作学生的时候,那时都叫做‘西洋’,叫‘西洋史’、‘西洋哲学’,而不叫‘西方哲学’。‘洋’和‘方’的意思似乎有一点不同。你要说‘方’字,那是个地理的概念,你在西方我在东方,这是地理的概念。如果是说‘西洋’的话,那是对‘东洋’而言,‘东洋的精神’、‘西洋的精神’,这里文化的涵义更多一点,不但是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个文化的概念。但是1949年以后一般都用‘西方’,不用‘西洋’了。大家知道,你要说东方、西方,这两个词是eastern、western,如果带有文化内涵的话,那么东方是Oriental,西方是Occidental。”(《西方哲学精神》第3-4页),我服膺何兆武先生的观点,所以摒弃“西方”而采用“西洋”。

2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2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云:“下篇当作于民国二十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4页)。卞僧慧《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六八期《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书》”,中华书局2010年,第152页。

3 梁启超《怎样做〈玄奘传〉》,《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梁启超集》第19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请读下列专家的高见：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论及“玄奘之《成唯识论》”时说道：“玄奘一生事业，为介绍世亲护法等一派之佛学于中国。自印度返国后，其全部精力皆用于翻译，实可谓佛学之忠实的介绍者。然正因其如此，故其所倡导之宗派中，最少中国人思想之倾向。”¹

现代享有盛名的佛学专家吕澂（1896—1989）说：“在隋唐佛学的各个宗派中，慈恩宗被看作最接近于印度佛学的。”²

当代佛学专家郭朋（1920— ）说：“唯识宗，基本上是玄奘照搬印度的一个佛教宗派，……尽管由于太宗、高宗父子两代的大力支持，由于玄奘、窥基师弟二人的积极努力，唯识宗得以创立，并曾盛极一时，但是，窥基去世之后，唯识宗实际上也就随之而衰微了。在中国佛教史上，它是继三论宗之后的第二个短命的宗派。……这就再一次地清楚地表明了：任何宗教（以及各个宗教的任何教派），不管它们如何把自己高悬于天空之上，而归根结底，它们却始终是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之中，一旦脱离了这一土壤，它们也就必然地要自身难保了。”“翻译佛经，是移植；创立宗派，是改造。唐代宗派佛教的创建过程，也就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僧侣地主阶级对于佛教进行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因此，‘中国化’程度越高的宗派（例如禅宗），生命力就越高；反之，就将是短命的（例如三论宗、唯识宗）。”³

著名的哲学史家劳思光（1927— ）说道：“玄奘游学印度，承护法后学之戒贤之教，回国即大倡《成论》（本文笔者按，《成唯识论》之简称）之说，成为一大势力。然此一支教义纯以印度已有之教义为依归，故不能称为‘中国佛教’。而中国佛徒弘扬此种教义者，亦实是提倡返回印度之思想运动，与三宗（笔者按，指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立教之旨皆不同。”“玄奘一系之学，在立场上全宗印度十大论师，故其理论特色，亦即十大论师思想之特色。”“玄奘之学虽盛，在中国哲学史上之影响则远不及中国三宗。盖返归印度之宗旨，基本上即不能与中国哲学之进展要求相配合也。”⁴

因为陈寅恪先生的论证中对玄奘唯识宗的兴衰史特为重视，所以我们不惮烦地引用近代诸名家之言以阐释之，此其一。近代诸家无一例外地明确指出，即令是当时声名煊赫，如日中天的玄奘，他返国后竭尽全力搬用、传布他自“西天”学得的“佛法”，原来完全是“舶来货”，因而在“东土”无法生根，不久即萎死。历史的结论太无情，竟是“不能称为‘中国佛教’”，悲哉悲哉！玄奘尚且如此，何况不如玄奘者，更何况大不如玄奘者！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唯识宗”“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前车之鉴，难道不值得当今中国语言学家深思吗？

陈寅恪先生“以史为鉴”，所举的第二例是“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这是指清末民初的唯识学的复兴，晚清著名佛学专家杨文会居士（1837—1911）倡导唯识学，从日本搜求中土佚失的唐代唯识论典籍多卷，并刊行于南京。他创设祇洹精舍、金陵刻经处，弘扬唯识论，著名人士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等皆来南京访学。杨文会歿后，研究、传播唯识学的继起者为欧阳渐（1870—1943）、梅光羲（1880—1947）、

1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三卷第17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

2 《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五第2716页，齐鲁书社，1991年。

3 郭朋《中国佛教简史》第234—235、21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卷第275、279、28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韩清净(1884—1949)等人。但是进入20世纪,愈行愈远,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变异之大、之剧,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1949年,这是尽人皆知的。越一千多年再起的唯识论自然是复兴无望,陈寅恪先生在1933年的预言可谓“言中”了。

陈寅恪先生为证明其理论,举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初唐“唯识学”的盛极一时的典型例子,但是“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陈先生随之举了他正经历、目睹的唯识学的“复兴”例,并作了预言:“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陈先生思想的可贵之处,不仅在陈述往史,而且洞察、揭出原因:“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言简而意赅,真乃颠扑不破之论。

陈寅恪先生进而申论,再次预言:“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对语言学人而言,陈寅恪先生的这几段话不啻是警世钟。

总而言之,陈寅恪先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特别重视以往历史上的和他撰文当时的对待“外来之学说”的教训,可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他先后列举三例,一是“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之唐代唯识宗,二是死灰复燃之近现代唯识学、三是他目睹的正在进行的“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陈先生对它们的结论也是三条:“卒归于消沉歇绝”,“疑终不能复振”,“其结局……亦终归于歇绝者”。凡此种种,于社会,于人心,也于学术,皆具震撼性。如此识断,坚定而坚决。陈寅恪先生谆谆之言,旨在告诫国人,覆辙不可再蹈。这就是陈寅恪的思想的光辉所在。

那么,陈寅恪先生的主张是什么?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最后画龙点睛:“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如此之论,当日振聋发聩,今日其金石声犹震响于中国学坛。七十余年,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思想的正确,历史还将继续证明这一思想的正确。无怪乎李慎之先生云:“陈先生是真正继承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传统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已经不仅是史学家而同时是思想家了。”“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21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陈寅恪先生关于外来学说与民族文化的学说的这一段文字,发表于1933年,但是于今日、于将来,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仍然光芒四射,愿我语言学诸君勿谓其为“老话”而忽之。

三

黄宗羲《明儒学案·发凡》云:“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故讲学而无宗旨,即有嘉言,是无头绪之乱丝也。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杜牧之曰:‘丸之走盘,横斜圆直,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七八十年前陈寅恪先生以那样的话语和形式表达的光辉的思想,当今中国语言学人的

表达式则为“不崇洋，不排外”六字，还可进一步定以为“双‘不’方针”四字，这就是当今中国语言学人的“新话”。

今日中国语言学人为什么要提倡“不崇洋，不排外”？因为“崇洋”必成仆欧，“排外”则为井蛙。“仆欧”当是19世纪后半叶的外来词，英语boy的音译，它的意思是佣人、仆役、侍者，较早的书证见于李伯元（1867—1906）的《文明小史》第四十六回。我们是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学者，我们的尊严不能被剥夺，也拒绝将尊严自我抛弃，我们绝不不甘为“仆欧”！“崇洋”是万万行不得的；反之，闭塞保守，夜郎自大，就必然杜绝了一条取人之长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的途径，因此“排外”也是绝不可取的。

不崇洋就可以具有清醒的头脑，坚定的信心，“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坚持本民族的立场和传统；不排外就必然具有宽广的胸怀，强健的吞吐能力，“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以营养自己健壮自己。具此相反相成的态度，就绝不会蹈“忠实输入”者的覆辙，而陷于“终归于歇绝”的可悲可泣的境地。其目的，一言以蔽之：“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

要“自成系统，有所创获”，就必须竖起自主创新的大旗。

我以为，《中国语言学》杂志创刊号上所载的《发刊辞》是十分全面、非常正确的：“中国语言学人的宗旨应是，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

四

1943年，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陈寅恪先生困蹶颠沛之时，却能仰望星空、纵察往史、瞻视未来，吟咏出诗一般的美辞，充盈着乐观，满怀着豪气，这一段噌吰铿锵的文字，正是我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我们应该齐声朗读，我们的子孙应该万代传诵。请听：“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犹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¹

时隔六十多年，陈寅恪先生的预言已经应验了，“阳春”、“盛夏”之日已经迤邐而临神州大地。

“试看今日，近十几年，中国方始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康衢大道，这是令每个中国人感到无比兴奋的。再过二三十年，甚或四十年，只要国泰民安、政治清明、吏治整肃、政策得宜，中国将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综合国力将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员，我满怀信心，有五千年深厚文化积淀的深根，有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坚实基础，中国的学术（包括语言学）必然大放光芒，在世界学坛上不再处于弱势，不再当‘配角’，不再仅仅呼吁在引进西洋学术时‘中国化’，不再仅仅要求具有‘中国特色’，而会像一千多年前的唐代文化那样光辉灿烂。”“‘智者睹形于未萌’，既然预见到辉煌壮丽的时期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到来，我们今天就应该具有觉醒的意识，紧紧把握空前的良好机遇，坚持‘不崇洋，不排外’二原则，继续吸纳当今世界所有兄弟民族的文化精华，奋力荡涤因长期处于弱势而形成的如梁启超所鞭挞的崇洋心态，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追

1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求强大，自信必胜，我们应该满怀豪情地说到：‘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¹

中国语言学家应该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

继承，开拓，创新。

参考文献

- 卞僧慧（2010）《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
- 陈士强（1992）《佛典精解》，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陈寅恪（1980）《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陈寅恪（1980）《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陈寅恪（1980）《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 杜继文（2006）《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
- 樊克宁（2008）《王元化访谈录》（上），《羊城晚报》。
- 冯友兰（2001）《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第二版。
- 傅新毅（2006）《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 郭朋（1989）《中国近代佛教思想史稿》，巴蜀书社。
- 郭朋（1990）《中国佛教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 何磊（1999）《唯识宗在中国近代兴起原因探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
- 何兆武（2002）《西方哲学精神》，清华大学出版社。
- 黄宗羲（1985）《明儒学案》，中华书局。
- 蒋天枢（1981）《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 劳思光（2005）《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慎之（1992）《守死善道，强哉矫——读〈吴宓与陈寅恪〉》，《瞭望》周刊第42期。
- 李慎之（2000）《“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思想家陈寅恪》，《炎黄春秋》第2期。
- 梁启超（1995）《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梁启超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刘梦溪（1996）《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杨文会、欧阳渐、吕澂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 刘培岳（1995）《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四川教育出版社。
- 鲁国尧（2011）《语言学和接受学》，《汉语学报》第4期。
- 鲁国尧（2008）《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 吕澂（1991）《吕澂佛学论著选集》齐鲁书社。
- 杨廷福（1988）《玄奘年谱》，中华书局。
- 杨维中（2008）《中国唯识宗通史》（上）（下），凤凰出版社。
- 于凌波（1995）《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

附记：陈寅恪先生，近年来被尊为思想家，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这句话讲得何等正确：“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当今学人争相研读陈寅恪先生的论著，成为思潮。然而，人文学科之一的“语言学”，面对“本民族”的陈寅恪的思想，却“波澜暂不起”，作为中国语言学家，能不汗颜？

¹ 鲁国尧《振大汉之天声——对近现代中国语言学发展大势的思考》，《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又《语言学文集：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古罗马思想家、剧作家塞内加(约前4—65)在其《书信集》第十二封中说:“最精湛的思想是共同的财富。”职是之故,我们语言学人,同样应该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研究其思想,运用到自己的语言科学研究中,辨明方向,判别是非,弘正祛邪,直奔光明的前程。

本文当是语言学界表章、汲取陈寅恪的思想的第一文，可视为中国语言学思想史论文。

2011年10月6日记于钱塘江畔

永新、攸县赣方言阳平调的两个来源

澳门科技大学 余颂辉

提 要 江西省永新县和湖南省攸县赣方言中有一些中古非浊平字今读为阳平调,通过对这些特殊字的语义类型和语言地理类型的研究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考察,可以判定永新、攸县赣方言的阳平调有两个来源:一是中古浊平字今读,一是小称变调。永新、攸县赣方言小称变调的表现形式为低调,这种现象与朱晓农教授的“亲密高调论”相反,笔者曾在《汉语方言中低频的小称变调》中对其说提出商榷,今再一次提出质疑。

关键词 赣方言 小称变调 低频

一 永新、攸县方言的阳平调

针对朱晓农教授的“亲密高调论”,本文作者在2009年的一篇文章¹中曾经讨论了汉语东南部方言中低频的小称变调问题。该文首先从前辈学者已发表的字音材料入手,证明闽西将乐县城关方言中那些读作入声调[21]的中古非入声字其实是小称变调的表现,其形式为低调,与朱说相反。接着分析了笔者曾经深入调查过的江西省贵溪樟坪畲话中一批读作[21]调的例外字,并将它们和其他畲话方言点的类似材料进行比较,指出这些“例外字”虽然在各地畲话中读音表现不一,但实质相同,它们和黎川等地方言中高频的小称变调具有一样的性质。文章还探讨了笔者的母语赣方言南昌话、其他地区赣方言以及广州郊区粤语的类似情况,并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证明了朱晓农教授对“嘎裂声”(creaky voice)理解的偏误,这其中就提到罗霄山脉地区赣方言中也存在以低频为表现形式的小称变调现象,当时限于篇幅,未能展开讨论。文章刊出后,一些学界同仁来函询问此事,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申说。

1.1 永新方言的情况

2008年1月、4月和7月,本文作者曾3次赴江西省永新县进行文献材料调研和方言调查:对该县境内几个代表点做了为期不等的调查,并对《永新县志·方言》中关于永新城关方言的描写进行了核查,因而对永新境内的赣方言分布情况和各土语的音系特征及其差别有了相对全面的了解。根据这些材料,结合当地人的语感,我们把永新县境内的赣方言划分为8种土语,这8种土语在声调系统上基本一致。从声调系统来看,现代永新方言除虹桥方言外,共有4个单字调,分别为:

阴平	35	边多专高低抽初聾伴八末急
阳平	213	平明唐奴来床才徐寒柿虾星

1 余颂辉《汉语方言中低频的小称变调》,载《语言科学》2009年第3期278-287。

上声 53
去声 33

比米短老女展古有混狠妥跪
社户害变对唱盖共病直白读

中古声调至现代永新方言声调的演变规律(从上面所举的例字也可以看出)为:中古平声以声母清浊分化为阴平和阳平;上声亦依清浊分化,其中浊上字除个别今读阴平调外,绝大多数与去声合流;中古去声字不分阴阳,这是该方言与毗邻的吉安、泰和、茶陵等地赣方言的最大区别;中古入声字大体依照中古声母清浊分化,清入归阴平,全浊入归去声,次浊入则两种情况都存在。8个方言代表点中,除县北部与安福县接壤的虹桥方言¹中古去声今归阳平只有3个单声调外,都遵循这一规律。并且8个方言代表点的声调调型一致,调值相同²。然而,其中却有不少口语常用的非中古浊平字单字今读阳平调,下面以所调查的石桥方言³为例来说明(先依中古声调地位排列,次依中古韵摄地位排列,暂时不明本字或本字难定的,统列一组):

中古清平 虾 k^ha²¹³

司公~sɿ²¹³

疔~哩 tiẽ²¹³

星~光:星星 ɕiẽ²¹³

中古清上 崽 tsə²¹³

鸟~哩:泛指鸟类 tiaɔ²¹³

中古浊上 倍 p^he²¹³

李~哩:李子 li²¹³

白 tɕ^hiu²¹³

冷大~:很冷 lã²¹³

中古清去 架~哩:架子 ka²¹³

粽 tsɿŋ²¹³

中古浊去⁵ 树 ɕy²¹³

鼻~子 p^hi²¹³

轿 tɕ^hiao²¹³

柚~哩:柚子 iu²¹³

髻 p^hã²¹³

中古清入 答回~te²¹³

中古浊入 叶~哩:叶子 ie²¹³

勺 so²¹³

本字待考 □~开口 a²¹³

桠 a²¹³

搨 ts^hə²¹³

生活的(一般用于动物,和“死的”相对应) sã²¹³

蜂 frɿŋ²¹³

爪~哩:泛指爪子 tsao²¹³

宰禽类的内肾 k^hau²¹³

簿 p^hu²¹³

蚁蚂~i²¹³

肫⁴鸡~鸭~tɕ^hi²¹³

动 t^hɿŋ²¹³

碓 tæ²¹³

袋~子 t^hæ²¹³

巳辰~午未 sɿ²¹³

豆泛指豆子 t^hə²¹³

嫫体垢 mã²¹³

踢 t^hia²¹³

盒~哩:盒子 ho²¹³

笛 t^hia²¹³

□~哩:影子 ʃ²¹³

窠地上的小坑 k^huo²¹³

钉名词 tiẽ²¹³

槁花生~kao²¹³

帚~哩:笤帚、鸡毛掸 tɕiu²¹³

桤 tsɿ²¹³

厚形容词 ho²¹³

断 t^hʃ²¹³

褂 kua²¹³

痱沙~p^hi²¹³

帽 maɔ²¹³

售销~ɕiu²¹³

链~子 liẽ²¹³

舌 ɕie²¹³

榭 fo²¹³

1 发音合作人甘继文,调查时52岁,小学教师,世居虹桥村。

2 去声调值许多发音人念得较3高,似可记为44,但是和最高的5比起来,又不足4,故统一处理为33。

3 主要发音合作人戴发昌,调查时72岁,退休教师,世居石桥镇梅田村,在石桥镇长大,20世纪50年代曾在武汉读书和工作,调回故乡已50年,此后未再离开过本地。

4 客赣方言中,此词既有读作阳去的,又有读作阴平的,当是来源于群母隐韵或臻韵,因与《广韵》“章伦切”的“肫”义同,暂以此字训读。

5 按,树,《广韵》又臣庾切,上声;痱,《广韵》有3个反切,唯“扶涕切”与“热疮”语义相合,而“符非切”,“风痱,病也”于义未安;轿,《广韵》又巨娇切,平声。

□ 拳头心向上使劲打对方的肚子 $t_{i\eta}^{213}$

因此就有:

爪~哩 $tsa\dot{o}^{213}$ ≠ 爪 张牙舞 $tsa\dot{o}^{53}$

李~哩: 李子 li^{213} ≠ 李姓 li^{53}

厚 形容词 $h\dot{o}^{213}$ ≠ 厚 忠 $h\dot{o}^{33}$

冷大~: 很冷 $l\check{a}^{213}$ ≠ 冷~水 $l\check{a}^{53}$

链~子 $li\check{e}i^{213}$ ≠ 链 项 $li\check{e}i^{33}$

豆 泛指豆子 $t^h\dot{o}^{213}$ ≠ 豆 豌 $t^h\dot{o}^{33}$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就我们目前所调查到的字音材料来归纳的,由于目前没有系统地进行词汇调查,所以,还会有不少遗漏。其次,其中的某些字,不同的发音人读来并不一致,有的读阳平,有的则读作符合其中古音韵地位的调类(本调),如:“司”,在“司令”一词中,所调查的7个方言点都读作 $[s_1^{35}]$,但是,在“公司”一词中,一部分发音人读作 $[k\eta^{35} s_1^{213}]$,一部分发音人却读作 $[k\eta^{35} s_1^{35}]$,甚至同一个家庭内部的不同成员,也有差别。看来,这种读音的不同与语用情况有关。

永新方言的这种现象也曾有人注意到,《永新县志·方言》(1992: 720)就指出永新的“石桥、日光一带,有一部分古全浊上声字和个别清声母去声字,今读阳平,如冷 $l\check{a}^{213}$ 、柱 cy^{213} 、厚 $x\dot{o}^{213}$ 、近 $t\check{e}i^{213}$ 、户 fu^{213} 、政 $t\check{e}i^{213}$ 。”¹但在我们的调查中,除了“冷、厚”外,其他字发音合作人并无这类读法。孙宜志(2001: 75-76)对南昌大学中文系1998级硕士研究生萧小云(永新县台岭乡人)调查后提出,永新方言的中古全浊入声字今读归入阳平,从而总结出赣方言存在“全浊入声今读归阳平”的新类型,2007年的同名专著依然延续这一观点。考察孙文给出的4个中古全浊入声例字,“盒”、“舌”“白”3个字标作阳平调,而同样为口语常用字的“十”标作去声调,但从孙文p.116所列的永新方言声韵调表中却看不出这种格局,甚至“白”字还归入去声调。如果排除误记的可能,“白”字在其调查时应该有阳平和去声两种读法,孙文在讨论不同的问题时选择了不同表象的字音材料。根据本文作者2008年的调查,永新北乡确实有部分人念字时将“白”字读作阳平,具体表现为:白~个:白的 $p^h\dot{a}^{213} uo^{40}$ ≠ 白雪~ $\epsilon i\epsilon^{35} p^h\dot{a}^{33}$ 。这也说明,某个字究竟读作阳平调还是本调,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1.2 攸县方言的情况

一些中古来源不同的字都读作阳平调,这种现象在赣方言乃至整个汉语方言中还不多见,这似乎是永新方言的声调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这种现象也不单为永新方言所独有,根据陈立中(2005: 116-124)的调查,湖南省攸县(新市)方言的中古声调今读分调情况与永新方言一致,而其阳平调[13](单念时调值接近[213])的辖字中也存在大量不合音系规则的现象,除去那些暂时写不出本字的字,还有许多来源于中古其他声调的口语常用字,如:

屈~子 $t'i^{13}$

帚 鸡毛~, 鸡毛掸子 $t\epsilon y^{13}$

架~子 ka^{13}

桎 a^{13}

嗲 tia^{13}

勺 fio^{13}

蛤~蟆 ke^{13}

瘡 pie^{13}

诌 欺骗 tai^{13}

仔 小, 形容词 $t\epsilon i^{13}$

爪~哩, 爪子 $tsau^{13}$

躁 发脾气 $tsau^{13}$

搅 搅动; ~屎棍, 捣乱的人 kau^{13}

鸟 $tiau^{13}$

调~整; 玩耍 $t'iau^{13}$

背~里, 暗地里 poi^{13}

碓 春 toi^{13}

1 出于忠于原作的考虑,本文引文除将原作中的调型符号改为调值外,其他不作改动。

等等。翻开地图可知，永新县的东面为吉安县，北面和西北分别是安福县和莲花县，西面则紧靠湖南省茶陵县，在现行政区划中与攸县并不接壤，但是从历史地理关系来看，乾隆九年（1744）从永新、安福两县分置出莲花厅之前，湖南的攸县和江西的永新一直是邻县，今攸县境内的居民中也有很多大姓如刘、龙、文等来源于永新，看来，这种现象在这一地区是有历史渊源的。

二 中古非浊平字今读阳平调的性质

2.1 语义类型的比较

本文作者2004-2007年在江西省贵溪市樟坪畲族自治乡和2005年在江西省上高县镇渡乡调查时发现，当地有一类字，单字今读不符合相同音韵地位的字在该方言中的今读声调格局，而是读作一个“特殊调”。这其中，上高镇渡方言的这个特殊调是一个高升调[↗]，有比较丰富的词汇对应规律，从形式上即可以判定是和宜丰方言A类变调性质相同的小称变调（参邵宜，2006：38-44），这一点前辈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论及（颜森，1986：22）；樟坪畲话的特殊调[21]，不同于今读类型的任何一个调类，游离于“四声八调”系统之外。而在永新、攸县方言中，这些特殊字则是读同今阳平调，这种相似性颇值得探讨。

永新、攸县方言的这种现象会不会是该方言的底层（substratum）呢？如果是底层，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来源不同的字今读都归入阳平调呢？仔细考察这些今读阳平调的“例外字”，发现其中有不少和江西境内许多具有小称变调的方言中那些常读小称变调的字是相同的。我们和赣方言中小称变调比较丰富的黎川方言（据颜森1989；1993；1995）相比较，有不少相似的词，限于篇幅，仅举部分例子：

表一 永新、黎川方言中相同的小称变调词

方言点 例词	永新	黎川
虾子	虾哩 k ^h a ²¹³ li ⁴⁰	虾公 ha ²² kuŋ ²² ₅₃
帚	帚哩 tɕiu ²¹³ li ⁴⁰	笱帚 hiɛu ³⁵ tɕiəu ⁴⁴ ₅₃
豆子	豆 t ^h ø ²¹³	豆仔 hɛu ¹³ ₃₄₁ ¹ uɛ ²⁰
髻	髻 p ^h ä ²¹³	火髻 fo ⁴⁴ p ^h aŋ ¹³ ₅₃
□用拳头打人	□拳头心向上使劲打对方的肚子 tiŋ ²¹³	□~背 tuŋ ³⁵ ²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黎川方言，还是上高、宜丰方言，其读作小称变调的字都以中古浊平字居多，正是这种巧合，使得罗杰瑞（1973，据译文1985：29—41；1982，据译文，1987：101—103）认为邵武方言中的类似现象是原始闽语中送气的浊音的反映，因为邵武方言中那套送气的中古全浊平声字今读入声调，这其实是因为对材料的取舍不当而产生的

1 黎川方言阳去调[13]，在名词仔尾和儿尾前变为[341]调，这时名词仔尾和儿尾读低轻声[20]，如果“仔”、“儿”是充当动词的助词或者后面的名词词尾不是“仔”、“儿”，则词尾读中轻声[30]，阳去调不变调。这表明，第一种类型的变调既是连读变调，又具有语义上的表示“小”的意义。

2 这类写不出本字的字，因为在所属方言里单字今读归入阳调，不符合赣方言中古全浊声母字声母今逢塞音塞擦音时读送气辅音的规律，所以颜文把它看做是变音现象。